

中國何其有幸而有劉曉波

但昭偉

台北市立大學教育系教授

2017年7月13日，劉曉波的死訊傳來。由於新聞的封鎖，在中國大陸的人大多不知道，一部分知道的人大概也不以為意。在台灣，基於諸多因素（如關心本土議題甚於非本土議題），對劉曉波病逝的反應也稱不上熱烈。7月14日當晚七時左右，在中正紀念堂國家戲劇院的一個角落邊，有位女性講者追悼劉曉波並陳述劉曉波死亡的意義。當時聚集的群眾約莫一、二十人，媒體工作人員廝身其中；同一時間是雲門舞集在自由廣場上的預演活動，觀眾從各出入口湧進，起碼有上萬人，老中青少俱全。

要說台灣人對劉曉波之死的反應太冷漠，實在是冤枉了他們。台灣人從1987年解嚴以來，歷經許多政治上的風浪，好不容易才能夠視政治波瀾為日常生活中的常態，得空在仲夏夜去參與一流的藝術表演，無暇關注一個被稱為「中國良心」的劉曉波之死，看來也不應被責備。

但假如我們接受「台灣前途與中國大陸發展息息相關」的事實，劉曉波之死所反映的事實及蘊義，就值得這島上有識之士嚴重的關切。

劉曉波一生的遭遇，約略反映了中國大陸在49年後的歷史進程。假如把時間軸拉長，他的一生是自清朝末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寫照。中國大陸在今天當然已沒有「救亡」的問題了，沒有人能否認中國大陸近卅年在軍事、國防、外交、交通、運動、教育、科技、商業、貿易、都市發展上的重大成就。我個人認同中華文化，也有中華民族意識，幾年前在知道大陸有能力把載人太空船射向太空時，內心不等地也有愉悅之感（中國人終於站起來了！）。這些成就顯示中國人有能力來移植、操作及內化「現代的知識、科技及組織機構」。

劉曉波關切的顯然不是中國的救亡問題，他關心的是中國的「圖存」問題。

也就是：中國應該以什麼方式來治理？共產黨專制呢？還是民主呢？其實，中國的圖存問題與救亡問題也不是全然沒有關聯。假如中國是一種「黨天下」的統治，即便這類似帝王統治的體制在奉行「父權主義」（*paternalism*）之下，能把國家治理的井然有序（好似新加坡一般），如此的秩序也會是一時的、短暫的、表面的，在道德上的價值不高（*undesirable*）。人類這百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也是許多學者頻頻指出的，採行民主體制的國家不太會有大規模的暴動和飢荒，民主國家之間迄今尚無戰爭。歷史經驗當然沒有必然性和普遍性，但做為長期性的觀察結果，仍舊值得參考。何況在民主體制中，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會受到相當的保障，任何有權力的人和機構會受到制衡，權力的分散比較能避免權力的腐化和濫用，通過定期選舉的政權轉移會讓社會比較穩定，國家政策的制定及執行較能透明公開（因此較理性）。康德認定我們人自然地會有追根究柢的形上傾向（*metaphysical disposition*）；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認定我們人自然而然有一種政治上的傾向（*political disposition*），這種傾向會驅使我們去追求個人的自由、尊嚴和平等，並以此為基礎去追求一個正義的民主社會。為什麼是民主？因為民主社會最能保障（不是絕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尊嚴及平等；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和「個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做為一組價值，兩者的關係原來是互為表裡。

劉曉波在「中國如何發展」這問題上採取了一個明確的立場，他也因為這個立場而賈禍。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他就表明了這個立場，2008年的《08憲章》只是他一貫立場的延續，其內容在台灣人讀起來真是毫不足奇的理所當然，不外是民主的理想、個人自由和人權的保障、憲政的實施和威權體制的譴責。除主張的理念並不稀奇（有人認為，《08憲章》只是要求中國政府去監督及實施那些中共憲法中已經有的東西），劉曉波更是以他一貫溫和的態度來進行理性的訴求，並沒有動到任何人的一根汗毛。

《08憲章》的主導角色及自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堅持民主改革，是劉曉波在201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主要原因，也是他在2009年被判入獄的理由。

2009年12月23日，劉曉波案一審當天，他在法庭宣讀了〈我沒有敵人

——我的最後陳述〉，文中他說道：「……僅僅因為發表不同政見和參加和平民主運動，一名教師就失去了講台，一個作家就失去了發表的權利，一位公共知識人就失去了公開演講的機會，這，無論之於我個人還是之於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年的中國，都是一種悲哀。¹」很顯然地，在這陳述中，他深深地明白他個人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有緊密連結。

劉曉波是個有歷史感的人，他很清楚，中國雖然在 1978 年進行了開放改革，這改革開放也不是沒有成果，但在政治上，當今的中國仍然是「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說穿了，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專制獨裁並沒有改變，只是從「家天下」轉變而為「黨天下」而已。²就是這種歷史感，才會促使他感嘆他個人和中國的遭遇。

對比之下，當下生活在台灣的知識分子就不會有像劉曉波般的感嘆。台灣在 49 年後的歷史命運比不上中國大陸那麼樣的慘烈，但直到解嚴前（1987 年），也都還是「黨天下、家天下」的威權統治。因為提倡民主而被軟禁、判刑、暴力對待的台灣人，在解嚴之後也絕無僅有了。就此而言，台灣的民主進程大概比中國大陸要早了卅幾年。而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不同進程也還不只是時間上的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它們之間的不同是根本性質的不同。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Metzger），早在 1992 年出版的一篇文章中就提醒我們，台灣在政治經濟的成就被低估了。依墨子刻的想法，台灣自解嚴後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就是一種特別的變化，反映了政治、經濟及思想的多元。³我們不妨可以推想，因為如此的多元，台灣的知識分子在解嚴後，就再也不會遭遇到中國大陸知識分子在今天仍然會遭遇到的下場。

劉曉波對中國大陸仍處在黨天下統治的認知，和最近台灣新黨大老許歷農的認知有很大的不同。在 9 月初，許歷農發表為什麼他不再反共的公開信。提到今天中國大陸的思想及作為「完全符合正常國家發展的原則」，他因此贊成互利雙贏的兩岸統一。好個幸福的許歷農！在台灣民主體制下，只要不侵犯他

1 信息自由觀察工作室編。2010。《劉曉波檔案》，頁 5-9。香港：溯源書社。

2 參見《08 憲章》之「前言」。

3 墨子刻。1992。〈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自覺問題〉。《中國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余英時等著，頁 83-138。台北：聯經。

人的重大權益，個人言論自由就會受到充分保障。試想中國大陸的一個退休老將軍，發表了一篇贊成「兩國論」或「台灣獨立」的公開信，他會有什麼下場？劉曉波因為他清楚的歷史認知和政治判斷而招禍；許歷農的歷史認知和政治判斷，在考量六四以後的中國發展及近來習近平的嚴厲控制下，絕不能說是正確，但他大刺刺地公開他的想法，卻毫髮無傷。專制與民主的反差由此可見。從中國近代史的發展來看，身在台灣的我們是何其的有幸，生在中國大陸的劉曉波是何其的不幸！

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有像劉曉波如此遭遇的人當然不在少數。稍遠的有清末的譚嗣同等人，近的有魏京生。將來呢？以中華文化的底蘊來看，像劉曉波這樣的人將會不斷地出現，一直到中國走上民主之路。我這麼說絕非沒有理由。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雖然從來就沒有實施過民主，但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替中國找出路時，都發現民主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做了如此的選擇）。墨子刻也指出，學者的研究告訴我們，對清末民初儒家知識分子而言，肯定民主是件很自然的事。在當下中國大陸也提倡儒家的事實上（不管他們提倡的理由為何），儒家的復興會對民主的要求添上柴火（而不是撤下柴火）。儒家思想雖然無法由其本身產出民主政治，但其中有民主的主張，這種主張對中國民主化的提倡不會相應不理。再者，之前談到人性中自然有「政治傾向」，求自由、尊嚴和平等是人性的一部分，不僅為己求，也為他人求，這種人性不會因任何的外在條件而泯滅。更何況，民主是一種潮流，中國人有民主生活經驗的人愈來愈多，這種經驗不等地會轉換為對中共政權的要求。我基於上述的理由，因此認定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運動不會歇息，像劉曉波如此際遇的人在短時間內也不會少見。

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中，劉曉波對中國終將成為「人權至上的法治國」深信不疑。這種樂觀對比著控制力量日益強大的共黨統治，毋寧不是太過樂觀嗎？我認為在眼前看來，劉曉波的樂觀的確有些超過。但若就我上述分析，在未來，中國大陸還繼續的會有民主化的要求，這種樂觀也絕不是沒有道理。更何況，這種樂觀代表著劉曉波基於對人性的認識而產生的希望（hope），這樣的希望也不會因為中共的強大統治而絕滅。

在 1989 年的六四之後，劉曉波倡議民主人權就是以溫和、不帶仇恨、漸進、主動、積極、彰顯民主價值、理性且由下而上的方式為之。這一點他在 2006 年發表的文章〈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中講得最徹底。⁴ 是不是這種溫柔而堅定的方式讓中國掌權者心生恐懼？是不是掌權者知道這種「以愛代替憤怒與仇恨」的方式有它強大感人的力量，會像春雨一樣的滋潤萬物，終而會使中國產生全面的改變，才會讓他們心生警惕並進而採取全面的高壓封鎖？是不是這種非暴力而理性溫柔的抗爭方式被劉曉波定了調，才引起掌權者對他的怨恨及報復？

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中，劉曉波展現他高貴的人性。他對中國的未來表示樂觀，對與他接觸的官方人士有著高度肯定，對他的夫人劉霞的愛意表達尤其讓人動容，讓我不時想到林覺民感人至深的〈與妻訣別書〉。在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中，林覺民對他的愛妻說道：「吾愛汝至。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我不知道劉先生會不會和林覺民一樣，覺得生在今日之中國是件不幸的事？我覺得，就兒女情長的角度而言，他應該會覺得不幸！但他的不幸卻突顯了我們生為台灣人的幸運，我們有幸生在台灣！我們從他身上有幸看到人性可以高貴的程度。中國大陸也因為有他，還有繼起的劉曉波們，才顯得有生機。我們因此可說，中國大陸何其有幸而有劉曉波！

4 信息自由觀察工作室編。2010。《劉曉波檔案》，頁 105-110。香港：溯源書社。

